

悲劇屈原

李止治

悲劇是夕曛中微茫人間的清碧，而悲劇人物往往是時代高峯上把酒問月的詩人，他足以睥睨一世之鄉慮，他足可開拓萬古之心胸。靠著悲劇的啓示，人類理性得以清醒地照見人間的缺憾，從而激揚起追求真善美的精神，喚起道德行動的勇氣，探向茫茫廣袤的時空，以敲問人存的真義。

先秦南方文學的悲鬱情調，在宋玉悲秋的筆下如斯沉洩：「悲哉秋之爲氣也，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。」鬱結其情，悲而不露。做爲一個知識分子，他所感受與承擔的，除了時代的悲歡離合，最主要而能悚動生命的却是人性的風雨，漢代的箋注家王逸認爲這篇文章是「閔惜其師（屈原）忠而被逐，故作九辯以述其志。」南方文學的曙光自始即輝閃着清愁沈哀的氣息，自始便有理想沈淪所激發的人生孤憤，這大概就是所謂「怨」了。而離騷——生命困境的熬煎——在怨底下宣示了一個時代的悲劇，一個望道直行的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。他如何在放逐的天地中思索人生的真義？如何投下他掙扎後的抉擇與肯定？本著這一番真實的同情，太史公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寫下：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原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……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，然終無可奈何。」

一、
秋風起兮白雲飛，洞庭波兮木葉下，瀟湘，這優美迷人的名字背後，

隱藏著迴腸盪氣的悲涼。如果娥皇女英不追舜到此，淚洒湘竹成斑，如果屈原不放逐到此，自投汨羅，瀟湘風光總是地靈人美，一片「瀟湘」（清麗嘉祥）。可是完美固爲人生所嚮往，缺憾却爲人生所不免，屈原被放逐，他心理上的經履歷難，這一個悲慘的事件，點染了瀟湘的情天，只要稍有心靈的縱深體驗，點讀他生命的血淚創作，都會爲之嗟嘆不能終篇。

這是人爲的抑是天爲的呢？當人對生命的終極理想有所執着，是否他就註定要在現世上歷受苦難，與現實上的種種因緣相又相靡（性格悲劇之一）？自覺的追執道德理想，是否只是聖賢主觀的迷戀，而無關於實際問題的解決？還是從一個殘會的現實主義的觀點：只要是機會，無所謂原則，這樣人會活得更爲快樂呢？屈原的一生，自始至終有他堅持的原則，他的心境具體的呈現在離騷（楚辭中的代表作是離騷，表現的心境比較完整），而離騷一文，也常常把我們引歸人生的思索，喚起價值的估量。

從春秋過渡到戰國，卿大夫代諸侯而興，禮教文明的溫厚情懷翹然遠引，天道降爲王道，王道降爲霸道，這一個分裂的時代，熱心淑世的人本倫理學家一一出現，也一一不用（孟子爲代表，鄭衍則迂迴的從宇宙觀引入政治人生問題），他們的最大缺點不在不明瞭現實的國際交征的情況，而在於堅守道德的原則，侵犯了國君的愚昧與私心。在政治的漩渦中，嚐試了群體意識和個人自我的衝突滋味，知識分子的心靈擺盪在墨子和揚子間。一方面志切救國，爲此栖栖皇皇的投擲了自己整幅的生命，及至發覺權勢場中爭奪權利的醜陋面，才了解自己的努力並沒有收到預期的實效，反而招來小人的譏評。這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世界，大家惟利是視，爲了這個緣故，假如他不卑鄙的走上趨應之路，他便不願再做愚昧的投擲，損害個人生命世界的完整，而希望保有自我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屈原，他出生的時候，已是現實的機會主義者最爲吃香的時代，只要窺伺人君的意欲，善加利用，大者可以合縱連橫，小者也可以在政治圈享受權位。這種風習的形成，正顯示一個時代沒有正確的客觀理想，錯誤的利益觀念結集成一股強固的惡勢力，遮掩了真理的光芒，人與人間的關係由於利益的交征而疏離陌生，而屈原的個性——正道直行，落在一個不相應的時代，正好成爲他的悲劇的起因。在這樣的時代裏，他嚐到了生命的兩極擺盪。

三、

堅守原則對一個沒有原則的人來說，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；而放棄原則對一個堅守原則的人來說，是一件極端痛苦的事。屈原在第一次放逐期間（楚懷王廿四年，依李曰剛中國文學流變史的考證）是深深體會到了。事實上當上官靳尚的革憲之讒時（懷王十五年），他已有所感觸，只是依賴著王一向的信任，他以為真理將挽回王的清明，也就心安理得，我行我素。可是當他發現王與他的心理距離繼續擴大之時，他終於覺悟了：同列爭寵的上官大夫勝利了。在政治場合中，不擇手段比擇善固執更為有用，因為它不必對什麼負責，而可以保有自己的私利，這就是官場的怪現象。

秦楚聯婚（懷王廿四年）、秦楚之會（三十年）都是屈原極力反對的，可是當一個人失去了別人信任的時候，他的意見便失去了慣有的力量，因此屈原的諫諍只為自己帶來傷心的放逐，而靳尚却可以犧牲國家而接受賄賂，鄭袖更可以自己的愚昧遮掩良知，在張儀的妥密安排下，懷王早成人家的掌上玩物了。屈原有政治的銳見，他看得清世界的局勢，也了解時勢的演變，他諫懷王殺張儀，不要到秦國赴會，可是懷王親近連橫陣線的小人，鬧得楚國被擯縱約之外，諸侯聯兵進攻攻國，而懷王却客死於秦，為天下譏笑。後悔總是遲來的口信，懷王被俘時應是悔之無及。

披觀歷史的資料，太史公掩卷長歎，他對屈原有一種蕭條異代的知己之感，也深為他打抱不平：「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原，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為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禍也。」然而歷史正確的論斷，究竟能為多少昏庸蒙蔽的心靈啓明？或只能同屈原一樣，成為團體眼中的敵人呢？

為了懷王的事，全國痛罵子蘭，而頃襄王即位，却以其弟子蘭為令尹，屈原有微詞，他不敢相信上官大夫這些狐群狗黨，會給楚國帶來任何光明的徵象，他更明白：凡是與上官大夫他們在一起的人，都會漸漸學得奸詐而變為腐敗。他在離騷寫下如此的句子：「余以蘭為可恃兮，羌無實而容長，委厥美以從俗兮，苟得列乎衆芳。」他的判斷越正確，他與子蘭的間隙便越大越深，他的正直又成為他的致命傷。頃襄王十三年，屈原再度被放逐，在漢北一帶枯槁行吟，一生抱負都將化為煙霧，尚不得世人的諒解（離騷：國無人莫我知兮）。他回想這一生的作為，所以落得這麼悲慘，不是自己不了解現實的人慾，而是自己不願扭曲人性的本質（離騷：余

固知謬謬之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……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為此態也。此處須注意屈原所忍與不忍者為何）。他的學識與才能足使楚國的政走上軌道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：博聞強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，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），而他的正直不足應付小人的陷害。因此窮困之極，他只有自斷楚天，獨抒天問：到底天地間是否存在著公理正義？否則公理正義為什麼一直消沈而不彰？當人性的風雨掩蓋了這些悲哀的疑惑，便只剩汨羅江水的低沉嗚咽了。

四、

曠達超脫與纏綿悱惻一直是評論文學家生命形態的兩個角度，曠達超脫所以成其「哲」，理性疏導了激盪的感情，而終以喜劇的氣氛出現。纏綿悱惻所以成其「癡」，感情的狂潮衝決了理性的支配，而瀰漫著悲劇的色彩。前者以莊子為代表，後者則以屈原為典型的悲劇詩人形象。

座落在中國倫理文化的座標中，屈原悲劇的戲劇層面在於內心正邪的交盪與善惡的抉擇。承受儒家傳統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精神，屈原擇善固執的個性使他成為一個悲劇人物。自離騷裏，我們不難領會屈原執着原則的內蘊激情，裏面充斥的論斷語氣時常會掀起讀者的是非之心。蓋屈原除了放逐引起的多重感傷之外，長存著一種價值的判斷，這種價值的色彩，在屈賦中所在多有。他不能放下處世的原則，不能泯滅自我的良知，在「卜居」篇中已作了堅決的選擇，而一再強調平素的立場；即便他可以乘桴浮海，隨波逐流，但他心中的激情使他難以離棄社會體系的關懷，因此對於漁父的超達也無法首肯。他的不能超脫，正是由於他的不能放棄論斷，太多的論斷使他的激情更為顯發，於是成就了他的「癡」。

班固認為屈原「露才揚己」，大概是不滿屈賦中過多的論斷語氣，從而聯想屈原平時一定詞尖語利，咄咄逼人。事實上當我們對於人生的黑暗面有所體會，我們將能採取更為同情的觀點，認同屈原的「豪傑」行為。固然，中國人文傳統有他高明的一面，在天地否閉之時，深根寧極，待時而動（大易知幾之教），但對於激情過盛的屈原來說，他寧可做為真理祭壇的犧牲，而不願落入無窮的等待，所以他的行動只是「悲壯」，不是「高明」，他的意識只是悲劇，還未蘊生超悲劇的意識。這種性格，無論如何，在不相應的歷史因緣裏，將以悲劇起，以悲劇終。六十五、六、廿。